

# 甘地和孫中山對傳統文化 和現代化道路的選擇

• 王輝雲

印度和中國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歷史過程中有着大致相同的經歷。從十九世紀印度的啟蒙運動到二十世紀80年代出現的關於「科學精神」的討論；從本世紀初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到80年代在中國大陸興起的「文化熱」，印中兩國知識界始終在探討適合本國傳統的現代化道路。甘地和孫中山對傳統文化及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和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段痛苦經歷。本文擬從現代化的角度對甘地和孫中山就如何改造利用傳統文化及如何對待西方文明作一比較分析。

## 西方的挑戰

在近代史上，印度和中國都曾飽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侵略壓迫的痛苦，印度淪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中國亦淪為「半殖民地」國家。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給印度和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與此同時，現代西方文明也為傳統的印度和中國注入了新的催變因素，促發兩國傳統社會發生了空前的變革，從而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 印度的現代民族主義運動

作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印度的現代化過程早於中國。在英國的統治下，印度社會發生了迅速變革，其特點就是西方化。傳統的經濟結構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地經濟體系的形成。隨着英國工業產品大量向印度傾銷以及現代工業在印度的建立，以村社為基礎的農業和手工業遭到破壞。作為英國的原

料產地和商品傾銷市場，印度的財富大量外流，同時，它也同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發生聯繫。伴隨着經濟結構的變化，城市化和商業化亦得到迅速發展，社會成員也獲得更多的改變身分地位的機會。但是，在這種急劇的社會變革中，社會上的低級種姓，尤其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則飽嘗失業和被壓迫被剝削的痛苦。

英國殖民者不但征服了印度，而且要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印度。為此，英國殖民當局利用行政手段在印度推行社會改革，發展新式教育，培養中產階級<sup>①</sup>。由於政治經濟活動的擴張，英國殖民當局需要大量的能够使用英語的印度人參加行政工作，遂採納了麥考萊(Macaulay)的政策，即在印度培養「一個具有印度血統和膚色，但有英國品味、觀念、道德和才智的階級」<sup>②</sup>。這種文化征服在客觀上開拓了印度知識分子的視野，使他們能够從新的角度比較印度傳統文明和西方現代文明。因而，許多印度的宗教和社會改革家如羅易(Ram Mohan Roy)、達亞難陀(Swami Dayananda Saraswati)、辯喜(Swami Vivekananda)等都大量吸收西方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向西方尋求真理蔚成風氣。

西方的挑戰既給印度社會帶來空前的危機，也為它的重生提供了契機。馬克思在談到英國殖民統治在印度的歷史作用時指示：「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使命：一個是破壞性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再生性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sup>③</sup>英國殖民者對印度次大陸一個個土邦的征服，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以及現代西方科技的引進，都為印度建立民族國家，推進現代化過程創造了客觀條件。

印度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標誌着印度人民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而進行的鬥爭揭開了歷史篇章。英語教育是印度現代民族主義產生的重要因素<sup>④</sup>。正是那些接受了英語教育並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的印度知識分子發動了印度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在甘地登上印度政治舞台以前，西化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印度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中起到了先鋒作用。他們熱衷於西方式的議會政治，相信通過議會鬥爭的和平手段，最終能够贏得印度在大英帝國治下的自治地位，在政治上取得獨立。在政治領域，印度的西方化是顯而易見的。

由於印度社會的西方化範圍有限而速度過快，印度社會的大多數人在迅速變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無所適從，更由於印度人在傳統上以文化和宗教為認同中心，這種以西化為形式的現代化便引起社會的不安和動盪。印度學者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在評論這種社會現象時說：「現代化似乎脫離了印度傳統，大有取代印度文化之勢。」<sup>⑤</sup>英國雖然征服了印度，建立了殖民政權，但是，這種政治上的征服並沒有使印度人產生「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甚至歡迎政權的更改，認為英國殖民政權比臥莫兒政權進步得多。

印度社會的認同體(identity)不是政治中心，而是宗教文化傳統。當西方化脫離了印度的傳統，要取代印度文化之時，民族認同的危機便產生了，現代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又加重了這種危機感。因此，隨着英國殖民統治與印度民族主義運動之間的矛盾加劇，便出現一個抵制西方化的、以復興民族文化傳統為主要特徵的民族主義思潮。提拉克(Tilak)和奧羅賓多·高士

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使命：一個是破壞性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再生性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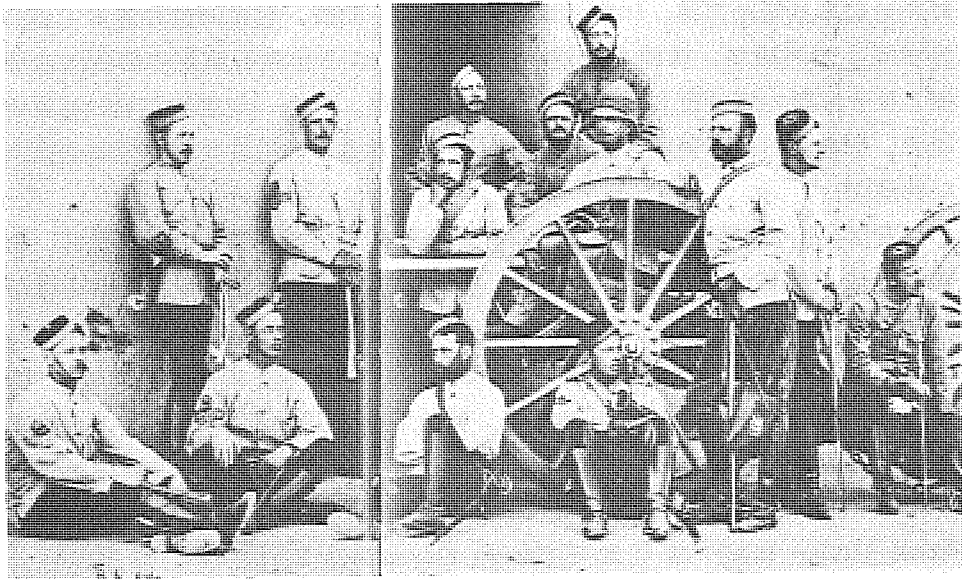


圖 在近代史上，印度與中國都曾飽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侵略壓迫的痛苦，印度淪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中國則淪為「半殖民地」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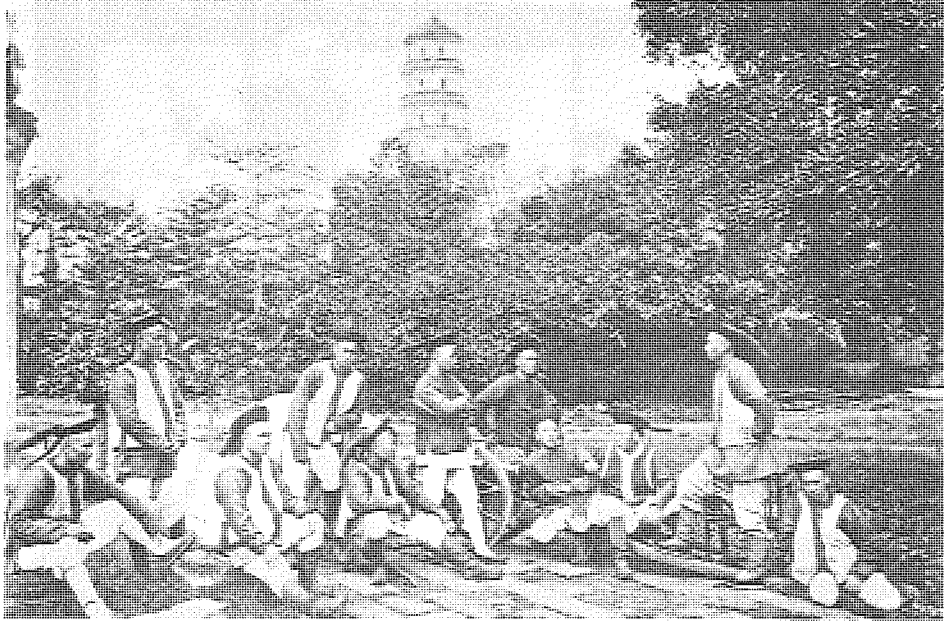
(Aurobindo Ghose)等一些主要領袖都大力宣傳民族文化傳統，利用宗教作為爭取民族獨立的政治鬥爭武器。一些激進的民族主義分子甚至號召使用暴力手段將英國人趕出印度。英國與印度之間的民族矛盾就這樣同傳統與現代和東方與西方的問題交織在一起了，如何選擇可行的現代化道路成為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們的一大困擾。

### 中國以革命和政治為中心的民族救亡

英國雖然征服了印度，建立了殖民政權，但是，這種政治上的征服並沒有使印度人產生「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甚至歡迎政權的更改。

在近代史上，中國也遇到現代西方的挑戰，但其對挑戰的反應與印度大異其趣。中國社會經歷了二千多年封閉性的、高度極權的政治統治，並且形成與之相適應的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具有強烈的排斥性。鴉片戰爭以來，雖然中國的門戶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西方的商人、傳教士亦隨之來華，沿海地區的通商口岸也出現西式學校、醫院、教堂和報刊等等，但是，直到辛亥革命時期，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仍非常有限。傳統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雖已傷痕纍纍，但其歷史慣性仍然阻礙着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到滿清王朝作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被推翻的時候，英語教育在印度實施已有八十年的歷史了。

與印度社會多元特徵相比，中國社會具有很強的單一性，因而對西方挑戰的反應單一而被動。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政治中心互為表裏，政治中心即民族認同體的核心，西方挑戰造成中國社會危機之一便是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富國強兵，抵禦外侵便成了中國步入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動力。鑒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敗於英國的堅船利炮，林則徐、魏源等有識之士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治夷」的強國之策。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洋務運動是中國向西方學習，向現代化方向邁出的第一步。但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意識形態框框束縛下，剛剛誕生的中國現代工業受到諸多限制。傳統的政治制度與現代工業的管理體制本來就充滿矛盾，「西用」硬性納入「中體」，造成現代工業的畸形發展，結果，



甲午戰爭一舉粉碎了洋務派實業救國的夢想。

甲午一役使中國的有識之士驚醒：中國要富強，不僅要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而且要在政治制度上效法西方，對傳統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因而，嚴復、康有為等人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雖然，政治改革是在西方列強逐漸瓜分中國、民族危亡的壓力與日劇增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保守派人物，仍然懼怕政治改革危及其既得利益，利用手中權力鎮壓了戊戌變法運動。由此可見，在中國政治層面的現代化遠比經濟層面的現代化要艱巨得多。

傳統的救亡意識不但使中國對西方的挑戰缺乏靈活的反應，民族危亡的急迫感也限制了對政治改革的多種選擇。面對清王朝腐敗無能，對外屢屢戰敗，喪權辱國，對內固守舊制，阻撓改革，激進的知識分子終於對「體制內」改革失去信心，正如孫中山所言：「由滿州人來將國家加以改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改革意味着給他們的損害。」<sup>⑥</sup>在傳統中國社會，政治中心對社會的變革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中國人選擇了以革命的手段改變政治中心的途徑來推進現代化。

辛亥革命失敗的歷史經驗證明，現代化在民族心理、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文化層面比在政治經濟層面實行起來更為艱巨。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西方式的共和政體，然而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卻按照帝制的軌跡運行。一次大戰以後，當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統治被革命摧毀而新的中央集權尚未建立而出現短暫的集權統治的空隙時，爆發了以思想啟蒙為主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理性、民主等西方價值觀念要溶入中國文化決非一朝一夕便能實現。中國政治體制的保守性導致社會變革中產生的內部動盪遠遠甚於印度，全盤西化和全面反傳統的激進傾向表明中國社會內部變革渠道的狹隘以及缺乏對現代化作多種選擇的機制。西方化從來未能在中國真正實行，因而，它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就更為強烈。但是，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價值觀

在中國政治層面的現代化遠比經濟層面的現代化要艱巨得多。

辛亥革命失敗的歷史經驗證明，現代化在民族心理、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文化層面比在政治經濟層面實行起來更為艱巨。



圖 孫中山(左二)與激進的同學合影於香港(1887年)

念仍佔統治地位的中國，在民族矛盾上升之時，救亡便成了全民族的最高價值。短暫的啟蒙運動方興即逝，救亡依然是回應西方挑戰的主旋律。

## 面對西方文明的不同態度

西方的挑戰及西方文明對印度和中國社會的影響在廣度和深度上頗不相同，然而，兩國的進步知識分子均把西方文明視為一種現代文明，在社會發生歷史性變革之際，向西方學習均成為一時之尚。西方不僅是科學、理性、民主的化身，而且也是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主義掠奪的代表。印度和中國都是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傳統文化的歷史沉積構成的民族心理，對於由西方挑戰引起的劇烈社會變革受到巨大震盪，東西方衝突的結果更造成這種民族心理的不平衡。因此，如何看待本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種價值判斷，儘管這種價值判斷同時受到傳統文化和具體的社會現實環境所影響。甘地和孫中山看待西方文明的角度非常不同，甘地更多地看到西方殖民主義對印度的掠奪和壓迫，以及下層人民因此遭受的痛苦、西方化對印度傳統文化造成的威脅；孫中山則更多地注意在東西方國家衝突中，西方文明所顯示出的強大力量。

甘地和孫中山看待西方文明的角度非常不同，甘地更多地看到西方殖民主義對印度的掠奪和壓迫、以及下層人民因此遭受的痛苦、西方化對印度傳統文化造成的威脅；孫中山則更多地注意在東西方國家衝突中，西方文明所顯示出的強大力量。

### 甘地的反西方化取向

甘地對於西方文明和印度的西方化均持否定態度，其原因並非由於他堅持僵化的傳統，反對社會進步，相反，他主張社會改革和宗教改革，推動社會前

進。他反對西方文明的物質主義傾向對人的道德觀念的腐蝕，工業文明發展造成的勞動的異化及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而更直接的是，他看到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殘酷和印度廣大下層人民的實際苦難。因此，他反對印度走西方化的道路。在他看來，西方文明表現出的強大力量並不值得稱羨，英國征服印度這一事實本身亦不重要，但是，英國殖民者創造的殖民地文化及其對印度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侵蝕則令人擔憂。他指出：「我們並非不懂怎樣發明機器，但是，我們的祖先發覺，如果我們一心追求這些東西，將會成為機器的奴隸，並失去道德操守。因此，我們的祖先經過慎重思考，認定我們應以手工勞動代替機器。」<sup>⑦</sup>對於印度出現的模仿英國，通過西方化的形式追求財富和權力的社會現象，甘地感到異常痛心，斷言：「如果印度模仿英國，她注定滅亡。」<sup>⑧</sup>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甘地反對的西方文明實際上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主要是指壓迫弱小民族、追求私利、崇尚功利主義、城市化、工業化，而非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價值觀念。事實上，甘地從《聖經》和托爾斯泰、羅斯金(Ruskin)、梭羅(Thoreau)等許多西方人那裏吸收了大量思想。對於任何一種文明或文化傳統都不能簡單地不加區別地給予肯定或否定，而應加以具體分析，對於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亦應作如是觀。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與現代的社會現象在每一社會中都同時並存。看待傳統文化亦應注意其複雜的特性。印度文化的主體是印度教文化，馬克思對印度教的複雜特點曾經作過精彩的概括：「這個宗教既是縱慾享樂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慾主義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扎格納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sup>⑨</sup>甘地對於印度的傳統文化也是有選擇地繼承，有選擇地批判，但是，在對比西方文明和印度傳統文化的時候，甘地則使用了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方式將二者嚴加區分，認為「印度文明傾向於提升道德，西方文明則宣揚非道德」<sup>⑩</sup>。很明顯，他把西方文明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壓迫等同起來，把印度社會所面臨的危機歸結為西方文明對印度文化傳統的生存發展的威脅，來表達對英國殖民主義及殖民地文化的否定。

對於印度出現的模仿英國，通過西方化的形式追求財富和權力的社會現象，甘地感到異常痛心，斷言：「如果印度模仿英國，她注定滅亡。」

## 孫中山的向西方學習

與甘地相反，孫中山則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待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他將中國在東西方衝突中所遇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歸結為中國傳統文明的衰落和現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中國淪為「次殖民地」是由於西方國家在物質文明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在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時代，中國閉關自守，變成「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sup>⑪</sup>。

儘管孫中山看待西方文明和中國傳統文明時也使用了以道德為標準的價值判斷，認為「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sup>⑫</sup>，但是，他承認西方國家強盛是由於發展了現代文明這一事實，並且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化是一股世界潮流，隨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世界已變成一統一市場，強權政治將主宰世界，這是不以人的

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發展規律。面對這樣一個新世界，中國為了生存就必須學習西方的現代文明，走富國強兵之路，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上獲得政治經濟的平等地位，「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sup>⑬</sup>。

西方的挑戰給中國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即「亡國滅種」的危險。印度雖然被英國征服，亡國之後亦未出現中國那樣強烈的「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中國人的這種憂患意識反映了中國人對民族文化的認同首先表現在對國家的認同，在這種社會環境中，盲目排外的民族情緒極易被統治者用愛國主義的口號煽動起來，以達到其反對政治改革、維護既得利益之目的。「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並未使孫中山將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同現代西方文明等同起來，相反，他認為要化解這種危機，振興國家，就必須向西方學習，吸收現代西方文明，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民主制度，建立現代工業，增強國力，才能改變中國被列強欺侮的局面，使世界各國平等待我之民族。因此，孫中山把學習現代西方視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他強調日本的成功經驗值得中國效法，指出：「日本從前的文化是從中國學去的，比中國低得多。但是日本近來專學歐美的文化，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強之一。」<sup>⑭</sup>

### 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

甘地和孫中山對待西方文明和本國文明的截然不同態度與他們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有着直接關係。印度的西方化是英國殖民主義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英國殖民者不但以武力征服了印度，而且還以西方化的方式貶低否定印度傳統文化，打擊摧毀印度人的民族自尊心，造成一種民族自卑感。提倡西方化的民族主義派別不但未能推動建立民族國家的進程，反而使英國殖民者造成的兩個印度——傳統的農村的印度和西化的城市的印度——的距離日益擴大。這同傳統的種姓制度將社會分割開來的社會現象頗為類似，只不過英國統治者變成了印度社會的高級種姓，西方文化取代了婆羅門高文化的地位。無疑，這種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無助於恢復印度人的民族自信心，從而推動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壯大。因此，甘地繼承了復興民族文化傳統的旗幟，把宗教改革和社會改革同民族主義運動結合起來，選擇了一條同西方化不同的道路來推動民族主義運動，並以此來實現其重新整合印度社會的目的。他從宗教道德角度激烈抨擊西方文明和高度讚美印度文化傳統，對於恢復印度人的民族自尊心、平衡民族心理，對於保持民族文化傳統的完整性以及推動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和民族國家的建立，都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西方化在中國同其在印度的命運恰成鮮明對照。儘管中國被西方列強打開了大門，但始終存在本土政權，這一代表國家的政治中心是中華民族認同體的核心。在東西方衝突中，中國知識分子更加注重的是民族危亡，本國政權被西方人奪取則意味着「亡國滅種」，遑論民族文化傳統？所以，在帝國主義侵略的重壓之下，強國便成為對西方挑戰的最直接反應。西方的堅船利炮同中國的大刀長矛，經過較量，優劣自明；西方國家的強盛和中國的衰落，使在文化中心與政治中心同一的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相信，中國文明已落後

西方的挑戰給中國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即「亡國滅種」的危險。印度雖然被英國征服，亡國之後亦未出現中國那樣強烈的「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

儘管中國被西方列強打開了大門，但始終存在本土政權，這一代表國家的政治中心是中華民族認同體的核心。

於西方文明，因此，向西方學習以改變中國落後面貌的要求與日劇增。這種社會要求同滿清王朝的保守改革形成尖銳對立。雖然，滿清王朝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但他們早已被傳統的儒家文化所同化，且由於他們是中國政治中心的代表，他們頑固守舊的政策便激起社會革命。這種社會革命實際上是要求現代化和固守傳統的社會力量之間的衝突。因此，西方文明成為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同本國保守勢力進行鬥爭的精神武器，西方化因之便成為他們重新整合中國社會、復興國家的最實際的選擇。儘管辛亥革命後建立的西方式共和國並不成功，但孫中山終未放棄通過吸收西方文明來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努力，只不過後來更注意如何將西方文明溶入中國的傳統。

## 傳統與現代

在西方的現代化理論中，有一種錯誤的傾向，即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傳統被視為社會進步的障礙，只有摧毀傳統，現代化才能實現。這種反傳統思潮忽視了傳統在社會變革中的巨大影響。在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全面反傳統和全盤西化顯然都是行不通的。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如何利用改造傳統，使之有助於社會進步，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在印度和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重新整合社會，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同擺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的民族主義鬥爭緊密交織在一起，甘地和孫中山在這一實際的政治鬥爭中，都曾利用傳統為其政治鬥爭服務。但是，由於甘地和孫中山對如何重建印度和中國，即對未來印度和中國的設計這一重大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以及兩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狀況不同，他們選擇了兩條不同的道路。甘地強調社會改革，主張從個人解放的角度推動社會進步；孫中山則強調政治革命，主張從國家政權的改善的角度用國家的力量帶動社會進步。因此，甘地的民族主義具有文化民族主義的特徵，而孫中山倡導的民族主義具有較強的政治色彩。

甘地強調社會改革，主張從個人解放的角度推動社會進步；孫中山則強調政治革命，主張從國家政權的改善的角度用國家的力量帶動社會進步。

### 甘地強調社會改革的文化民族主義

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鬥爭中，甘地強調以民族文化傳統作為重新整合社會的基礎，他主張保持民族文化認同，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蝕，激烈反對西方文明和印度走西方化的道路。由於人們常常把西方化等同於現代化，並把堅持傳統與反對社會進步劃等號，甘地往往被看作是反對現代化的人物。其實，甘地反對現代西方文明，堅持民族文化傳統，並非堅持印度教正統派所拼命維護的僵化的宗教傳統和社會制度，相反，他反對阻礙社會進步的正統派所堅持的僵化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並力求改革。然而，他並未選擇以西方化的方式來推進社會變革，因為西方化的直接受益者仍是印度社會的高級種姓。為了徹底解放遭受傳統的社會制度和殖民主義制度雙重壓迫下的廣大下層人民群眾，甘地繼承並發揚了印度歷史上虔誠派運動的非主流文化的傳統，把民族主義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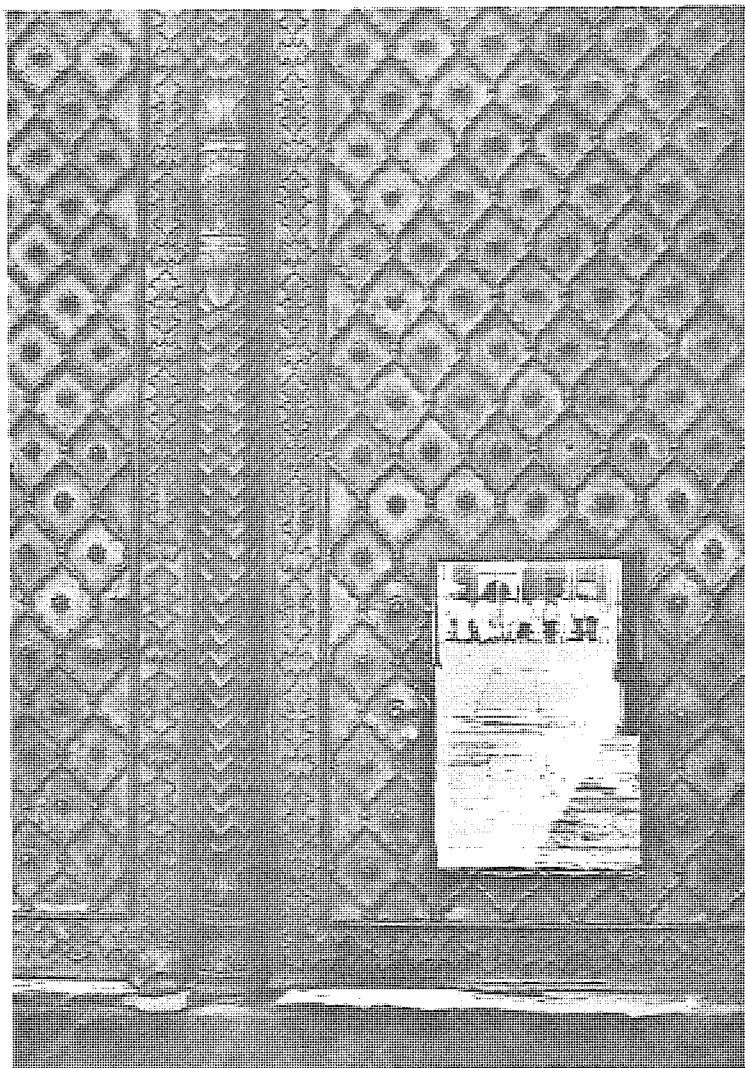


圖 甘地強調以民族文化傳統作為重新整合社會的基礎，他主張保持民族文化認同，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蝕，激烈反對西方文明和印度走西方化的道路。

同社會改革運動密切結合起來。在印度爭取民族解放的政治鬥爭中，正是甘地利用傳統的形式奠定了印度現代政治的基礎，為政治現代化指出了一條有別於西方化的道路。

甘地以前的民族主義運動在一個很長時期內未有突破，其關鍵原因在於，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未能有效地調動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這一重要政治資源。印度早期民族主義領袖們熱衷於西方式的議會政治，即在大英帝國的「體制內」的改革活動，通過以簽名、請願等形式向英國殖民當局爭取民族權利，進而達到印度自治。這種形式的民族主義活動具有極強烈的精英政治的色彩，且有政治行乞之嫌，因而，廣大下層群眾既無興趣又無法參與。極端派的民族主義分子採用暴力手段進行恐怖暗殺活動，不但不能達到推翻殖民統治的目的，反而給殖民當局鎮壓民族獨立運動的藉口，結果增加人民群眾的恐懼感。由於民族主義運動採取了西方化的形式，使傳統上處於政治邊緣的農民被排斥於政治鬥爭之外，而在政治中心地區，民族主義運動和殖民當局的力量對比又異常懸殊：另外，英國的殖民統治還使許多人相信，印度文化屬陰而英國文化屬陽，陽盛陰衰，印度接受英國的殖民統治似乎是天經地義的。英國的殖

民政策嚴重摧毀了印度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勇氣，民族主義運動採取非暴力鬥爭的方式被視為軟弱民族在不得已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策略。

針對英國的殖民文化和西方化在印度的影響，甘地另闢蹊徑，利用傳統宗教的形式宣傳民族主義。首先，他重新解釋印度的傳統宗教，認為宗教並非是引導人們脫離現實世界去尋找天堂幸福的工具，而是可以用來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印度教中神的概念被甘地解釋為真理，對神的信仰就是「堅持真理」(Satyagraha)。甘地宣稱神並不是全知全能的，也不主宰個人生活和人類歷史，相反，神寓於個人的社會行為之中。人們只有在淨化個人、淨化社會的實際活動中才能體驗到神的存在。為了達到證悟神這一宗教目標，每個人就必須積極參與社會改革和民族主義運動，同一切非正義的社會現象進行鬥爭，因為政治活動是宗教活動的組成部分。脫離社會的宗教解脫不但無助於個人擺脫現實社會的壓迫和束縛，也背離了宗教的本義。篤信宗教的印度廣大下層群眾普遍信仰印度教的「再生」和「業報」的教義，當甘地使用通俗易懂的宗教語言把證悟神的宗教追求解釋成為對社會進步和民族自治等具體的追求時，民族主義的現實政治鬥爭便成為廣大下層群眾普遍關心、積極參與的自覺行動了。甘地正是利用了傳統的方式一改政治只是政治家的遊戲的局面，使億萬印度人民投身於民族主義運動中來。

為了恢復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甘地對非暴力進行了重新解釋。印度的傳統宗教都信奉非暴力(ahimsa)。耆那教以嚴格奉行非暴力而著稱，把非暴力置於信徒們正行的五戒之首，要求對一切生物實行絕對的不害。非暴力的概念在佛教中有了發展。作為一種戒律它不僅消極地要求不害，而且還增加了泛愛眾生的積極內容。印度教也把非暴力作為「五德」之一，但對非暴力的解釋則很靈活。甘地把非暴力解釋成為愛的精神力量，一種普遍適用的抽象的道德原則和追求真理的唯一手段。堅持非暴力就要以愛的精神對待一切人，包括自己的

針對英國的殖民文化和西方化在印度的影響，甘地另闢蹊徑，利用傳統宗教的形式宣傳民族主義。

甘地把非暴力解釋成為愛的精神力量，一種普遍適用的抽象的道德原則和追求真理的唯一手段。



圖 篤信宗教的印度廣大下層群眾普遍信仰印度教的「再生」和「業報」教義，當甘地使用通俗易懂的宗教語言把證悟神的宗教追求解釋成為對社會進步和民族自治等具體追求時，民族主義的現實政治鬥爭便成為下層群眾的自覺行動了。

敵人和作惡者。非暴力鬥爭的對象是惡，而不是作惡者，因為作惡者的內心深處也具有人類所共有的善性，只是由於其善性被情慾和利益所蒙蔽。非暴力鬥爭的目的不但在於消除邪惡，而且還要出於愛心，使作惡者覺悟，改惡從善。在政治上，非暴力鬥爭總是以不合作的形式出現，即不同實施錯誤政策的統治者合作。如果被統治者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統治者的任何政策的實施都會大打折扣。然而，在一個野蠻政府的統治下，不做順民，必然會付出坐牢、殺頭等巨大代價。所以，甘地認為，非暴力鬥爭只有強者才能實行，因為這種鬥爭是以自己忍受痛苦和犧牲的行為來制止作惡者繼續作惡。這種不懼痛苦和犧牲的行為正是精神上強大的表現。通過重新解釋傳統的非暴力概念，甘地重新喚起了印度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勇氣，為下層群眾普遍參加民族主義運動，充分調動建立民族國家的政治資源起到了巨大作用。

普遍參與是政治現代化的一項重要特徵。在甘地之前，西化的印度民族主義領袖們所要求的就是印度人普遍參與政治的權利，但是，他們通過西方式的議會鬥爭方式，並未達到目標，相反，甘地使用傳統的方式，將政治同宗教結合起來，用傳統的宗教語言闡述現代政治，看似過時，實際上則「將印度政治生活的組織基礎擴大並理性化了」<sup>⑩</sup>。由此可見，傳統與現代並非絕對對立，在一定條件下，對傳統的改造利用得當，可以更有效地推動現代化。

### 孫中山強調國家政權的政治革命

推翻滿清王朝，結束中國二千多年的帝制，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活動，也曾成功地利用傳統推進中國現代化。清朝末年，西方民主思想尚未在中國廣泛傳播，兩千多年來的儒家正統思想及其倫理價值觀念牢固地統治着中國社會。作為這種正統思想的代表——滿清王朝——同歷屆王朝一樣，使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強行意識形態管制，任何公然向以儒家正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挑戰，均無合法的社會空間，因此，在中國實行社會改革必須以改變壟斷一切社會權力的國家政權為先決條件。由於中國社會受到西方思想的衝擊有限，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人數極少，從根本上否定皇權制度的合法性面臨着極大的困難。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孫中山領導的以推翻帝制，建立西方式共和政體為目標的革命，比歷史上以新天命代替舊天命的農民起義面臨着更嚴峻的考驗。這就是如何打破傳統觀念對人們思想的束縛，進而徹底否定帝制的合法性，吸引社會各階層人士參加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在解決這一問題上，孫中山採用了利用傳統為其革命目標服務的策略。儘管孫中山的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在於「建立共和，平均地權」，即以革命的手段徹底改變國家政權，然後，通過國家政權的力量實施社會改革之方案，但是，孫中山卻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作為號召，以吸引聚集各路反清人士，包括那些具有衰老心態的反清復明人士參加革命，從而調動了更多的政治資源，增加了革命派的力量。「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所宣示的民族主義具有極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但是，從文化傳統這個角度看，這種策略符合中國傳統的民族心理。中國歷代王朝統治造成的長期社會封閉、文化發展的單一性和大漢族主義意識，使中國人

對非漢人統治者很難從心理上接受。印度的西化知識分子公開歡迎並且支持英國殖民統治，認為英國的殖民政府可以幫助印度推進現代化。這是因為在印度社會政治並未滲透到社會其他領域，與政治中心並存的宗教中心、文化中心等在社會上具有更大的影響，因此，印度人在心理上尚能接受外國統治者。但在中國，即使是被中國文化同化的非漢族統治者統治中國，亡國奴的意識仍然存在於民族心理之中，因此，即使強烈主張西方化的激進知識分子，也沒人像印度知識分子那樣公開歡迎西方人統治中國，並且通過殖民地化的形式加快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孫中山正是根據中國文化傳統的這一特點，用傳統的方式宣傳其民族主義，用傳統的狹隘民族主義或大漢族主義意識為推翻強化這種意識的帝制服務。倘使孫中山在革命之初便提出激進的口號，便很難吸引相當一部分尚未接受民主思想的人參加革命。

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意識到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國行不通，反而會增加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動盪，尤其是在傳統的政治中心瓦解之後，軍閥割據、「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成為中國的政治現實，加上傳統的中國社會缺乏獨立於國家政權之外的整合社會力量的機制。重新整合中國社會，最迫切的問題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在國家的領導下，推進社會的變革。這種自上而下的改變中國社會結構的思想，不僅決定於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亦反映了孫中山自覺地利用傳統來推進其中國現代化目標。因此，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知識分子倡導個人自由、強調個體主義價值相反，孫中山晚年將個人自由視為造成中國人成為一盤散沙的原因，把個人自由等同於無政府主義；為了恢復國家的地位，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獲得自由，孫中山主張以犧牲個人自由來達到建設強大國家的目的。這種國家至上的主張同救亡凌駕於啟蒙之上的歷史現象是一致的。在傳統中國社會缺乏實行西方式民主制的現實條件下，孫中山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儘管它為新的政治集權主義開闢了道路。

## 結 論

甘地和孫中山在現代化過程中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他們的選擇受到兩國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西方化曾經是印中兩國追求現代化的一種模式，但是，這一模式在甘地和孫中山時代的印度和中國並未成功。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西方化只是印中兩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它對促進兩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產生了一些積極作用。從社會生活的不同層面來看，西方化在印中兩國的經濟、政治甚至文化系統的一些層面都影響重大。然而，甘地旗幟鮮明地反對西方化和孫中山追求西方化的痛苦經歷，證明傳統文化在印中兩國社會轉型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現代化不能也無法割斷文化傳統，企圖以西方現代文化完全取代本國的傳統文化，以便加速現代化過程，只能是欲速不達。況且，西方現代文化的內涵並非全然是有益社會發展的普遍的價值，而印中兩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價值觀念卻愈來愈受到那些進入後

孫中山主張以犧牲個人自由來達到建設強大國家的目的。在傳統中國社會缺乏實行西方式民主制的現實條件下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儘管它為新的政治集權主義開闢了道路。

現代化時代的先進西方國家的重視。隨着文化交流的日益廣泛深入，現代化的價值取向愈益明顯，如何選擇符合本國文化傳統促進社會發展的超越西方化模式的現代化道路，是兩國社會發展中面臨的新的挑戰。

### 註釋

- ① Martin Green: *The Origins of Nonviolence*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4.
- ② See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p. 86.
- ③ Karl Marx: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9), Vol. 12, pp. 217-8.
- ④ R. Suntharalingam: *Indian Nationalism: An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83), p. 42.
- ⑤ Ashis Nandy: *Traditions, Tyranny and Utopia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57.
- 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卷2, 頁62-3。
- ⑦⑧ Gandhi: *Hind Swaraj or Indian Home Rule* (Ahmedabad: 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 1983), p. 62, p. 34.
- ⑨ 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北京: 中華書局, 1981)卷1, 頁251。
- ⑩ Gandhi: *Hind Swaraj*, p. 63.
- ⑪⑫⑬⑭ 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卷9, 頁188-9、247、184、252。
- ⑮ Susanne Hoeber Rudolph and Lloyd I. Rudolph: *Gandhi: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Charism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4.

**王輝雲** 北京人，1955年生。1982年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分院旅遊管理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5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獲哲學碩士學位；1987年畢業於美國普度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學位；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比較政治專業博士研究生。發表的論文有：〈甘地宗教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特徵〉、〈非暴力在印度實施的可行性〉、〈非暴力鬥爭及其在中國的實施〉等。